



以在地视野书写文化内部丰富图景

—论梅卓长篇小说创作

□祁发慧

纵观梅卓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到她展现了藏族文学从社会叙事向精神叙事的转型路径。她不仅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对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深层思考,也通过灵性书写,为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持续的生命力。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书写民族精神这一命题,提供了深情且具有穿透力的文学答案

1997年,年轻的梅卓凭借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斩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出版社概括这部小说为“大草原魂魄激荡,藏民族雄魂史诗”。学者耿予方以长辈慈爱的口吻,不无赞赏地说她在“小小的年纪,有了大大的作品”,并立足藏族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评价道:“不仅是女性作家问津长篇小说的旗开得胜,而且在年龄上也显示了优势,在题材上也是新的开拓,可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突破。”此后,梅卓相继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月亮营地》、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诗集《梅卓散文诗选》等。多种文体间的自由切换,展露出她的写作才情,常年行走高原腹地的经验让她的写作更具地方意识。时隔23年后的2020年,梅卓以《神授·魔岭记》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授奖词中这样写道:“《神授·魔岭记》向伟大的《格萨尔》致敬,游弋于现实、历史与传说之间,穿行于实相与虚相之间,展现着藏族文化的神奇博大。”

如果对梅卓的写作进行一个总体性的量化,类型特点极为明显:小说以大气浪漫的灵性书写勾勒藏族社会的历史变迁,挖掘和弘扬优秀的藏族传统文化;诗歌和散文以感性柔情写尽高原风物,浸润民族人文情怀展现地域精神风貌。

丰硕的创作成果让梅卓成为藏族汉语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女性”“民族”“汉语写作”这样的形容或界定,成为研究梅卓写作的重要维度和视角,对女性意识的挖掘、对藏族文化的阐述和对自我认同的探讨等论题也随之成为研究核心和重点。不可否认,这是民族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惯有路径和有效途径。现有的研究已然从文学本体论角度肯定了梅卓写作的价值与意义,但也提供了一个值得反思的视角:假设抛开民族和女性身份、脱离藏族文学史的视域,梅卓的小说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意义何在?

书写动态的民族故事

《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通过文学叙事,勾勒出藏族安多地区农牧交界地带的文化转型与精神轨迹。梅卓善于撷取一些明亮的细节和词语放入小说标题中,不论太阳还是月亮,都赋予它们自然物象外的象征意义。在“部落”与“营地”之间,她展示了一个民族社会从内部发生变化的过程,其独特之处在于,她并未陷入猎奇式的民族书写,而是深入藏族生活的根基,从文化本体出发,审视集体主义的伦理遗产与现代性的文化冲击,给读者提供一种差异化的文化经验,同时也构建了属于高原民族的文化认同与精神谱系。

“部落”与“营地”不仅是生活空间的地理象征,也是藏族社会结构与精神秩序的隐喻。在《太阳部落》中,部落作为藏族传统社会最基本的单位,维系着人们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价值;在《月亮营地》中,营地象征着在外部社会压力下产生的过

渡性空间,这是现代社会逐渐渗透传统生活的节点。部落和营地作为空间上的边界,既是地理上的防线,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定义。在梅卓的叙事中,索白、阿·格旺、甲桑等男性角色的行动往往围绕“保全营地”“延续部落”的任务展开,这种任务本身就指向了权力的运行、身份的捍卫与文化传统的保存,同时也切中了小说中作为权力和地位象征的核心意象太阳石戒指和白银戒指。然而,现代性的发生和时代风向的转变让这些固有的边界逐步瓦解,也促成了主人公心理防备的动摇与自我认同的重建。由此便不难理解,梅卓塑造的男性人物形象不仅有潇洒浪漫的处事风度,又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家园情结,他们从藏族社会深处汲取的活力,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表现为一种主动的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从小说题目和叙事结构上看,营地与部落是被匿名化和隐喻化的,它们之间的张力揭示了藏族社会内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不仅体现在地域层面从牧区向农区过渡的多样性上,也体现在文化层面多民族交融的杂糅性上。牧区的游牧文化注重流动性与自由性,而农区的耕作文化更具稳定性与秩序性。农牧交接地带成为两者杂糅之处,这种杂糅不仅孕育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也加剧了个体身份认同的张力。正是这一地带的文化模糊性,使得梅卓的小说不仅是对藏族生活的记录,更是对“现代性”如何作用于民族地区社会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起,由一批作家在文坛掀起的“西藏热”和“西藏新小说”浪潮,通过猎奇、神秘的叙事方式,将西藏塑造为遥远、神圣而不可触碰的他者之地。梅卓的写作显然有所区别,她不是将藏族生活地区作为异域文化消费的对象,而是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进入部落故事的核心。她紧扣藏族安多地区农牧混合的区域性特点,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间的过渡性与文化自身的融合性呈现为文学书写,把代扎部落、沃赛部落、章代部落和宁洛部落的历史命运、社会组织、家族伦理乃至精神气象完整地展现出来。因此,她笔下的藏族生活地区不是静止的、浪漫的、神秘和概念化的,而是活生生的,有矛盾、有裂痕、有挣扎的鲜活之地。

从梅卓的描述中不难看到,她认识和理解的藏族安多地区并非是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对立面,而是一种具有自身发展逻辑的社群体系。她试图打破“中原一边疆”“现代—传统”等多元对立的民族写作框架,以复杂、纠缠的叙述方式呈现藏族社会面对现代性所表现出的多重反应。比如《太阳部落》中,在面对更大的历史变化时,两个部落之间的恩恩怨怨显得不足为重,年轻一代的部落成员需要为未来齐心协力;《月亮营地》中保护营地的英雄甲桑在枪声中倒下,但是月亮营地、章代部落和宁洛部落的人们开始结盟,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这种叙事既包括旧有理想的瓦解,也包括新型认同的组建,具有较高的文化自觉与思想深度。



思考新的自我和民族身份认同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社会整体进入现代性重建的历史进程中。梅卓敏锐地意识到,即使是远离政治中心的高原腹地,也已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部落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与家族结构正在遭遇剧烈的冲击。小说中的人物经历正是这种社会转型的缩影,他们在集体意识与个体自由、传统道德与现代价值之间摇摆、挣扎,最终不得不面对“走出部落”“走出营地”的现实。然而,这种“走出”并不是彻底的抛弃,而是在现有的文化张力中重新定位。因此,梅卓试图在小说中思考一种新的自我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而言,梅卓小说的一大特点是用英雄式的人物带动故事发展,而人物塑造的核心目的不仅是描述安多地区的社会环境和对藏族文化的再审视,更是对本土文化根源的寻找与演绎。这是一种深层的文化认同,涵盖审美趣味、道德立场、生活方式和情感寄托。

小说语境之外,梅卓思考的是传统民族文化和传统社会秩序在现代性发生之后的走向。所以在回应民族文化应对现代性发生的层面,梅卓的写作是一种通过传统故事重构精神世界的努力,因为她并非仅仅在讲述历史,而是用文学的方式发掘藏族社会精神结构的内核,并通过女性叙事、母性书写等形式,在温柔而坚韧的情感结构中,建立起对藏族社会现代性发生的文学回应。同样,在90年代社会转型的浪潮中,《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不只是对藏族文化的展示,更是中国多民族社会共同面对现代性命

题时的一种深度回应。或者说,梅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了各民族如何通过文学参与建构现代中国的精神面貌。这种努力,不仅体现了90年代写作的文化趋向,也赋予了民族文学以更广阔的现实关怀与历史意义。

探究文化内部的深层精神结构

90年代的中国文学经历了从宏大叙事向个体经验书写的转型,在此背景下,梅卓的女性经验不容忽视,她在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撑起了重要的部落历史。这种女性力量在《神授·魔岭记》中成长为一种母性力量,扉页上写着“献给爱女仁卓/13岁,以及永远”,作为作家母亲最长情的告白,这句话奠定了整部作品的情感基调:母性不仅是一种生育功能,更是一种文化记忆与精神传承的载体。小说中阿旺罗罗的神奇经历,让部落记忆不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或史诗中的英雄叙事,而是用母性书写建立与土地、血缘、语言、节日相连的个体经验,这种经验构成了藏族文化的精神底色,也强化了小说在意义层面对“文化认同”的强调。《神授·魔岭记》在延续90年代写作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灵性书写”的方向,通过神圣与世俗、超验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构建出一种超越现实叙事、回归民族精神源泉的文学空间。梅卓的写作也不再拘泥于社会现实层面,而是转向文化内部的深层精神结构。《神授·魔岭记》以格萨尔史诗为蓝本,虽然延续了对集体精神图谱的描摹,却通过灵性探索打开了与科幻文学共处的新路径。小说关心的不是家庭制度或伦理关系,而是人如何与天地和命运对话,这种转向

也体现了当代民族文学在“文化本体”层面的再激活。

灵性书写可以视为梅卓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主要特征。小说中的“神授”与“魔岭”作为核心意象,分别象征神圣启示与精神考验,构成了藏族文化认同的出发点与断裂点,同时也渗透于人物命运、地域历史与自然空间的深层结构中。梅卓通过神授者与被神授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灵性的传承机制,将藏族文化视为一种精神实践的共同体。其中“岭”这个意象既是地理的屏障,也是心灵的界限。魔岭之“魔”象征的必然不是妖异之物,更可能是现代语境下传统信仰的迷失与挑战。阿旺罗罗找寻的旅程,映射的是对传统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展望。较之于“太阳部落”“月亮营地”,“魔岭”超越了现实主义框架,进入一种融合史诗色彩、宗教象征与心理暗示的灵性空间。在此意义上,《神授·魔岭记》并非否定现代性的复古之作,而是在灵性与现代之间的一种辩证张力。比如,在描写人物时,梅卓更注重人物心理的流动状态与象征意义的赋予;用“山”“雾”“神音”等贯穿全篇,描摹出一种超越现实的情感空间。这种书写虽然不是一种纯异性的写作,却为民族文学提供了再生机制。

纵观梅卓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到她展现了藏族文学从社会叙事向精神叙事的转型路径。她不仅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对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深层思考,也通过灵性书写,为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持续的生命力。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书写民族精神这一命题,提供了深情且具有穿透力的文学答案。

(作者系青海民族大学副教授)

在广西当代文学史上,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壮族女作家陶丽群的中篇小说《插秧季》(《民族文学》2025年第3期)在开阔的乡土场景中书写女性经验与现实力量,不仅丰富了广西女作家的创作实践,更为当代女性写作提供了一条富有民族特色的创新路径。

稻田空间与主体建构

在新文学史上,女性经验或被镶嵌于国家民族的大历史中,或被聚焦到私人领域。回到真实生活,书写真切的女性经验,是女作家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插秧季》将活动场所设置在稻田,这一开放性的空间隐喻重构了女性与自我、社会及生活的关系,具有多重的指向意义。稻田作为开放性的生产空间,打破了传统女性文学常见的空间上的禁锢性,女性从家庭走向田野,首先是从“不可见的家务盲区”进入“可见的生产领域”。在小说中,不管是凌晨天光未亮时稻田里密密麻麻的忙碌人影,还是正午酷热中沉默劳作的困乏身影,抑或者月光中被蚊虫叮咬的恼火人声,女性从事农事劳动、参与农业生产的行为一直外显于人们的视野之中。这种“被看见”明确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存在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稻田的空间性质并不仅仅集中于公开性,更在于其生产性。与起居性质和消费性质的房间、街道甚至商场等日常空间相比,稻田作为劳动场域,处在“秧苗—水稻—稻谷”这一自然生长逻辑和“插秧—工钱—收入”这一社会经济逻辑之双重生产性维度的交叉地带,女性通过体力劳动,不仅助力农作物的生长,而且获得经济自主权,稻田在这里显然成为农业经济赋能和女性主体建构的象征空间。

稻田里,女性赖以生存和参与竞争的重要基

■评 论

从房间到稻田 由狭窄而宽阔

—理解陶丽群《插秧季》的多重维度

□李翠芳

对女性的细致描述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女性身体的关注。跟大多数作品不同,陶丽群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并不是基于欲望或者审美的逻辑,而是出于劳动的视角。或者是积极性的,小说中写到一副干活的好身板可以赢得团队中的权威,如慧嫂,可以缔结令人羡慕的婚事,如芳姐;或者颇有消极意味,小说写到在高劳动强度和恶劣条件下负重艰难前行的身体,如水清婶怀孕四个月依然吃力劳作,“我”被扁担切割得皮肉生疼。难得的是,女性人物们的心态始终是积极的,她们认可体力付出与经济收益之间的对等逻辑,因此对可以获得经济自主权和家庭贡献值的体力代价保持着一种自然而然的淡定和游刃有余的信心。

其二是对劳动经验及技巧的详细交代,比如女人们对插秧工作的细致准备、对插秧流程的了然于心、对进度和工作量近乎精准的估算,以及应对天色、气温及蚂蟥的熟练操作。这些在稻田这一特定场景中,成为女性非常重要的傍身技能和生存能力。由此可以说,《插秧季》中,当房间扩展为稻田,女性获得的不仅仅是更宽阔的物理空间,而是在劳动与自然的交织中,以开放性确认了女性的社会价值,又以劳动的艰辛和苦痛,探寻着女性主体的可能之路。

情感理解与价值共识

《插秧季》所书写的稻田空间不仅仅是公开性的,更是集体性的。插秧客一般三四人结伴搭伙合

作,这种临时性的劳动联盟构成了女性的情感共同体。小说多次描写劳动间隙见缝插针似的聊天,内容涉及解乏调侃、原生家庭、婚姻态度及处事方式等,这些对话看似可有可无,却奠定了她们相互之间的情感理解和价值共识的基础。

实际上,五四以来女作家对姐妹情谊的书写并不罕见,充分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精神价值的追求。相比之下,《插秧季》中姐妹情谊的书写更为独特、理性。

首先,区别于更侧重情感上的同理和共情的浪漫想象,《插秧季》中的姐妹情谊更为正向务实,其旨归是基于解决问题的互助协作。这个插秧客共同体虽是临时组建,但是每个人的性格、特长和能力却互补互长,成为一个结构合理、效高质优的团队。慧嫂经验足、人缘好,是有权威的决策者;芳姐身手好、效率高,是有能力的技术员;水清婶提供情感后援和医疗保障,作为学生的“我”是执行者和跟随者,增强向心性和凝聚力。在这段姐妹情谊中,每个人各有不同的位置和贡献,结合在一起便可以使插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迎刃而解。

其次,《插秧季》中的姐妹情谊表现出更多两性间的支持感。如在慧嫂家,丈夫和两个小叔子在工地上打工挣钱,慧嫂和公爹打理家里的地,男女合作,奔赴前景;雇主金达嫂家则更像是传统性别分工的现代转化,保留着“男耕女织”的框架,男人负责耙田翻耕,女人负责育秧插秧,既肯定男性的体力优势,又确立女性的劳作价值。通

过丈夫受伤的情节,小说将性别矛盾转化为生存挑战,让人物在共同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强化了共生关系。

因此,陶丽群笔下的姐妹情谊书写具有更加开放的姿态,打破了传统的女性“独语”视角,升华为人际间的体谅和厚道,一如小说中所写的艰难泥路上人与人之间“助人乃助己”的道理,甚至在雇主和插秧客之间,也有相互的理解和扶持。这表明当下的女性文学已从“性别自觉”走向“社会自觉”,正在建构起更具包容性的性别认知体系。

乡土叙事与中国故事

《插秧季》不仅仅是从性别出发的生命经验的表达,而是以女性经验作为起点,凭借乡土场景和乡村经验见证和表达了更广阔的中国现实。不同于许多民族作家对民族地区特有风情和自然景观的热衷和渲染,陶丽群小说的乡土叙事不是与世隔绝的浪漫桃花源,而是观察当下中国现实的一面棱镜。

小说对地理空间的分布和分界的描述,更多指向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地缘书写,既包括人与地理、人与土地的关系,也包括基于地理差异而产生的人际互补共生的生存方式。在南屏界内,不同屯子相互之间的辨称总带着南屏两个字,如南屏墙红、南屏凤凰等,而出了南屏,就统称为南屏了。尽管因为地理条件不同,两岸人的生活差距悬殊,但并不妨碍他们对这个地方的认同,陶丽群称之为

“隐秘而微妙的情绪”。事实上,小说虽然是以民族地区地理开篇,表达的却是普遍存在于中国乡村的“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段义孚《恋地情结》)。

陶丽群无意表现乡土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撕裂和重构,而是潜入传统农耕体系内,自然而扎实地通过春种秋收的时令认知和劳作节奏,表现人与土地的共生共存。与上述空间建构相对应的,便是作者通过对农历七月农作物的时令节奏进行描写所建构的时间诗学。陶丽群从气候和节令之间的联系说起,温差、湿度和日照的长短都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极大影响,所以七月十四这一夏秋之交的节令,就成为人们安排农事的关键依据。更难得的是,陶丽群也将人类的感知和农作物的生长进行对应,既以人类对季节和气候相对钝化的感受作为逆向反衬,又以人们对于节令的积极顺应和能动安排作为顺向呼应,最终在农耕秩序中凝结出“天人感应”的文化内核。

由狭窄而宽阔,由乡土及中国,陶丽群真实呈现了中国多元一体的社会结构。女人集体劳作的插秧场景,对接着传统农业的共同体劳作方式,又与现代文学张扬的个人主义形成对照,折射出更多维度的中国现实;女人间口述分享的农事经验和技巧,隐含着民间智慧,与书面传承的农耕知识和文化体系形成对应,表现出更为博大的中国文化;每逢插秧季,北岸民众渡河南下参加农事,这种季节性的空间越界行为,既是民族地区特有的交换方式,又与更广泛的城乡劳动力流动现象形成对应,表现出中国人互生共生的生存格局。

在女性写作层面,《插秧季》以对日常生活和互助传统的书写,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叙事视角;在民族文学层面,则通过劳动叙事重建人与土地间的关系,实现了民族书写和中国故事的有效对接。也正是这些创作上的探索,使陶丽群的创作意义得以彰显,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叙事路径。

(作者系济南大学文学学院教授)